

多元變遷與對話

-----海外(北美)華人文化認同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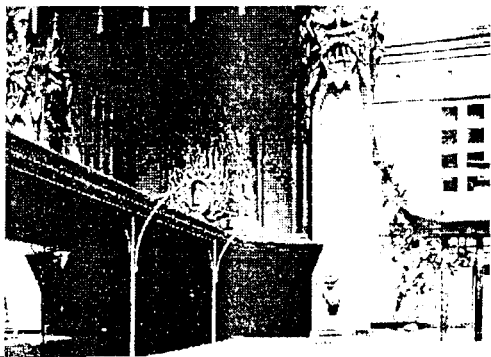
林慈信

引 言

海外華人是誰？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對中國的心態是如何形成的？可分幾類？他們在海外之社會文化中又扮演什麼角色？如何取得海外華人之合作？這些都是中國的領袖，及世界各地各界人士日益關注的問題。

本文不重述海外(尤其是北美)華人移民滄桑史，這方面的著述已不少。筆者擬從現今世界文化之處境(context)與動向(dynamics)之角度來看海外華人之身份定位(identity)及海外華人與非華人社會之關係。關心海外華人之決策領袖，需考慮從這種“處境”的角度(contextual perspective)來獲得深層的認識。

I. 現今世界之文化處境



過去五十年中，全球之文化已經歷了後殖民地、後帝國主義之階段。在這歷史階段中，新的殖民主義興起，以控制科技或其他資源來達到維持領導權(hegemony)之目的；同時，第三世界國家業以各種方法回應殖民主義，如反帝國主義之革命；排外之國家民族主義；固有傳統文化、思想及宗教信仰之

復興；或與西方世界隔離，獨立發展之自我孤立政策等。在此時期，各種政治

林慈信，來自香港，天普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知名海外華人跨越文化與信仰學者，神學院教授。

心理不斷浮現：對上一代帝國主義表示內疚(自罪感)；對外來帝國主義之憤

怒；以爭取經濟、制度或國際舞台上之利益為至高目標所表現出之貪婪等。無論如何，在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擺在全人類面前有三個重要的事實：

1. 多元文化之共存與互動。

全球已成為一個鄉村(global village)，或互為鄉鄰(global neighborhood)，不同文化共存於同一社會，在世界各國已是不爭之事實。如何取得文化與文化，種族與種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欣賞、尊敬、對話和合作，是各國人士面對之急務。大民族中心主義，不論是西方的或東方的，有意或無意的，都已不合用於未來世界。



2. 劇變中之文化。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人士往往從一種固定、不變之角度來研究東方文化，東亞人士從傳統(例如：儒家)之角度看自己之文化也有類似之心態。自從人類文化學之興起，兩次世界大戰使各種族人士有機會交流，及知識社會學(即馬克思學派之詮釋學)之抬頭，文化變動(cultural change)已是各學科學者從事文化研究之基本預設(presuppositions)之一。本文之基本預設之一，即是華人文化在二十世紀已起了重大之變化，無論國內、國外“華人意識”(chinese-ness)是什麼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而“華人意識”在二十一世紀勢必繼續變動，迫使我們不斷的嘗試了解，研究和反省。

3. 現代文化之式微。

十六世紀，西方社會踏進了“現代”時期。西方人本文化中、有文藝復興運動，以人為宇宙中心之世界觀取代了中古時期天主教教廷壟斷學術文化發展之趨勢；“人文主義”提倡復興古希臘、拉丁文學、哲學；加里略等之現代科學開始萌芽。與此同時，西方神本文化中亦經歷了一場劇變：宗教改革運動，使人直接藉信心與上帝和好(不靠教會之聖禮)，鼓勵教會內全體信徒積極之參與及全人之投入(所謂“所有信徒皆祭司”及工作上有神的“

呼召”(vocation)等觀念)。及極力將聖經翻譯成平民能明白之文字(如德文、英文)，同時推動普及教育等。十七、十八世紀，人本文化重視以理性、科學，直接體驗來獲得知識，此乃所謂“啓蒙運動”(現今後現代學者稱之為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十九世紀，康德及黑格爾以降，更以相對取代絕對，以主觀(主體)取代客觀，以人的體驗徹底地取代神的啓示等，使十九世紀之思想五花八門，莫衷一是。神本文化中，十七、十八世紀出現了信仰思想之新危機及新宗教經驗之萌芽，以本世紀末以外裔文化之傳播蔓延至中國、印度、非洲等地，基督教自一九〇〇年以來成爲普世之信仰。



一九六四年出生)

來二十年劇變。

上述之“現代”期，包括人本文化部分及神本文化部分，已於二十世紀末結束。理性及科學受到了嚴重的批判；後現代的“解構主義”，詮釋學把所有語言(字句)視爲歷史事實化爲“解釋”(即沒有事實可言)；所有道德標準化爲主觀之“價值觀”(values)；宇宙中所有的真理化爲“敘述”(narratives)。宗教信仰及群體亦同時受到了後現代文化嚴重的沖擊。海外華人正開始面對這普世、空前、不能逃避的現實。下一代的海外華人，是“X一代”(generation X)及“Y一代”之成員，他們與其

父母之代(即一九四五年

持有截然不同的宇宙人生觀；“華人意識”也因而將在未

4. 華僑？華商？文化中國之成員。

杜維明教授認爲，
“文化中國”中有

香港特區、台灣)。

“華僑”一詞有別。
國抱有熱愛之情懷。
發展，一直以來扮演

生活在這劇變中文化世界之華人，又有分成幾類？
“文化中國”一詞較爲能幫助了解普世華人之複雜性。而
三個象徵宇宙(symbolic universes)：

第一，是以華人、華語爲絕大多數之地區(中國、

第二，在稱之爲“海外華人”，以示與以前通用。
“海外華人”不一定像“華僑”或“僑胞”一樣，對祖國
可是，“海外華人”包括華僑及華商對中國文化之變遷發

著關鍵性的角色。在以“核心”(中國)與“邊緣”(海外華人)之間之關係，來描述第一及第二象徵宇宙之互動互靠性。

第三個象徵宇宙是指海外非華人，對中國有所研究或從事交流之人士，如經濟學家，記者，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學者等。認為此等人士(筆者認為應包括與華人通婚之非華人)應被承認為“文化中國”之一部分。在海外不少華人之團體，社群中，常可見到非華人之參與。他們代表了非華人社會(如美國)中對中國最感興趣，最敏感，收集最新資訊之一群，是不容中國及海外華人忽視之橋樑人物。

II. “中國意識”面面觀

上述四種普世文化動力----多元文化，文化變遷，後現代之來臨，及“文化中國”之多元性----乃當今海外華人身處之文化處境(cultural context)。接著我們把海外人士(包括華人及非華人)對中國文化所抱之態度作初步的分類。

1. 海外華人：“道統中國文化認同”。

過去五十年中，港台及部分北美華人，因對古典中國文、史皆之熱愛，往往認同“道統”(即德、道)之中國文化，並極力闡釋，提倡，宣傳。此等人士往往對西方文化抱一定的距離，甚至純批判之態度，認為中華文化經過西方文化之洗禮定會變質，保存固有之中國文化精華，對黃帝子孫來說，為義不容辭的。這些道德文化之維護者，可能對文化之變遷及多元文化共存之事實，敏感性較低；因此與他們有效對話的，往往是自身已對中華文化有濃厚興趣之人士(包括華人及非華人)。筆者會懷疑他們在二十一世紀之文化世界中能扮演怎樣一個正面的、積極的角色。

2. 西方人士：(文化帝國主義意識)。

與華人中“道德文化認同”相對的，有西方社會中一部分仍以西方為世界中心之“文化帝國主義者”人士。以美國為例，冷戰時間及後冷戰時期(一九八九年以來)，一部分美國人仍以自己國家之科技，太空探險，經濟及

軍事力量自豪，這與十九世紀美國對自己在歷史上要扮演之角色(所謂manifest destiny)有關。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某些美國人對外國(國際)事務不感興趣，並對世界各國人士移民北美抱有恐懼，認為美國若不注意，對失去身為“英語國家”之身份。上一代的美國人(指一九四五以前出生者)往往對中國既無知亦寵愛。這一代的美國人(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者)，仍存留著上一代之“不知其不知”(they don't know that they don't know)，而這不知之背後，是有意或無意之文化自我中心(ethnocentrism)。(此等自我中心，與傳統中國之“天下”、“華夏”觀念可有相似之處？)

3. 海外華人：“僑胞意識”。

“華僑”或“僑胞”，可能是第一象徵宇宙中(中、台、港)之人士最能了解的海外華人類型。筆者在此需指出：海外華人，或他們的祖先，於不同時期之“移民潮”或“留學潮”移居到海外。他們帶到海外的“中國文化”，經過長期居住海外之經歷(包括飽受排華政策之辛酸等)，已被“冷藏”或“僵化”。例如，美國各地之“老華僑”多來自廣東省台山或“四邑”各縣。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文化，往往是清末民初廣東珠江三角洲之農村文化。

筆者一位朋友曾描述加州州會沙加緬度市中的台山華僑，有一次子女結婚時，新郎要駕汽車將一頭乳豬送至新娘之家中，而新郎、新娘可能已是第三、第四代土生華裔！他們可能只是例行公事，對中國傳統婚姻習俗全不了解，甚至會覺得厭倦，無論如何，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文化”，只能代表他們的父母或祖先來美時期之鄉土文化。



七十年代以來，一部分從港台地區移居北美之華人，為子女日後不悖由立而落子不少心血。有的從孩子三、四歲便教他們背唐詩，四書。更多的父母組織中文學校(大的有一千學生以上)。利用週末上課，暑期送孩子到台灣參加中國語文、文化夏令營

等。孩子長大了究竟對中國文化認同有多少，在此不下結論，重要的是，不同“移民潮”來美之華人及他們的後裔，對“中國文化”內容之理解，都可能不一樣！不過，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離開中國時間愈久，對中國文化之

懷舊(nostalgia)情怀愈深。(In leaving China, they become more Chinese.)。筆者再次強調這種僑胞情懷，不代表所有海外華人之心態！

4. 西方人士：“同化主義”及其批判者。

殖民時期結束後，西方的新一代(一九四五至六四出生者)對上一對的大白人主義多有不滿者，在七十年代以來，對第三世界民族及文化多有欣賞，尊重者，甚至親身經歷，學習其語言，文化，信仰(如佛教、印度教)者。這一代的“嬰兒潮”(Baby Boomers)人士往往會感受到殖民主義及文化敵國主義在第三世界，及在美國境內之少數民族(如黑人、紅印第安人等)中所造成的傷害。不過不少“嬰兒潮”人士對非西方文化之欣賞是片面的，膚淺的，甚至是短暫的。美國主流文化之意識型態是“同化主義”(assimilationism)：移民來到美國，理當習英語，熟悉美國辦事方式(如準時赴會，公事公辦，不討價還價，公私分明等)，或甚至應學習喜好西方之飲食，體育，娛樂等。

美國社會面對龐大而不斷增長的亞裔群體(中、日、韓、菲律賓人等)，在“同化主義”及“欣賞第三世界”之間，常表現出搖擺不定的狀態。筆者認為，九十年代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同化主義”將再一次成為美國人之主流心態，對此華人不可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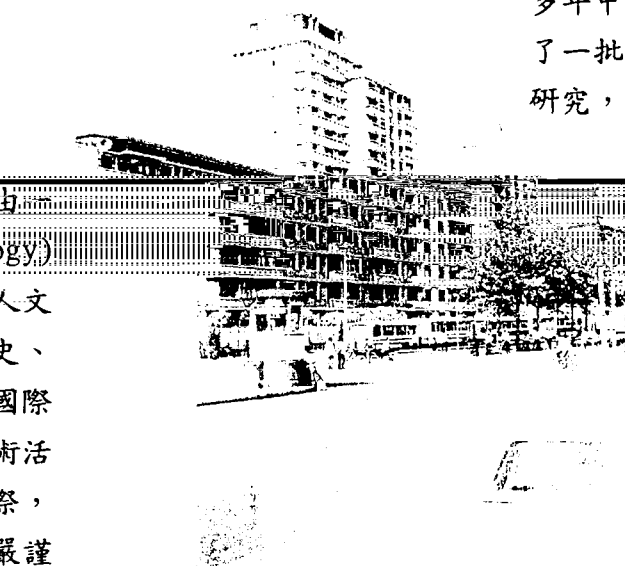
5. 海外華人：對都市文化及匿名文化之認同。

八十年代以來，海外華人群體反映出現代後期極度都市化之生活方式。不論是台北、香港、洛杉磯，多倫多，紐約，新加坡或悉尼傳媒(尤其是電視節目之綠像帶)及市場學已帶給海外華人一個劃一的大眾文化。本來簡樸、單純以台山老華僑為主的“唐人街”社會，在八十年代學會了去新移民發的美容店去“造型”。連第一、二、三代的華裔青年也熟悉港香之歌星及電影演員的名字。在都市文化沖擊下，傳統家庭漸漸瓦解，青少年得不到父母的關照及教導，“小留學生”在加州及加拿大過著獨立的生活，社會工作教育，宗教界等人士開始積極注意他們的需要，借用現代社會工作，心理輔導等原理與技巧，紛紛設立社區服務事工。這些家庭/青年服務人士，深感現代社會中人際關係之疏離“異化”(alienation)之嚴重性，“匿名”之個人身份(anonymity)之普及化，因此筆者認為他們對“中國文化”之定義

，也被都市化，及他們對都市化中青年/家庭之關注所影響。意思是：“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包括現代都市生活中的華人(如香港之中學生，台灣移居北美之小留學生等)。筆者認為這是當代海外華人之“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之一種，應被重視，及加以嚴謹之研究。

6. 新的中國意識：研究、謀福，合作。

自從尼克松訪華(一九七二年)以後，美國人民及北美海外華人對中國度抱積極的態度。鄧小平訪美(一九七九年)更代表中國對外開放，當時美國也有一段“中國熱”。例如筆者當時在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攻讀博士班，學校代表團由校長領隊至美東華盛頓，給鄧小平頒發了一個榮譽學位；天普同時是美國第一間與中國建立學術交流之大學。冷戰結束(一九八九年)，“嬰兒潮”(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出生者)已進入壯年期，克林頓總統上台(一九九二年)是“嬰兒潮”掌國家大權的象徵。柯林頓第一任期間(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對中國之政策可謂模糊不清，第二任則較清晰地主張強化與中國之貿易及交流。在這二十多年中美關係劇變之期間，海外華人中出現了一批積極的人士；他們對中國的意識可用研究，謀福，合作描述。



人文
史、
國際
術活
祭，
嚴謹
九九
經
？
代(X

西方之中國研究在越戰期間
九四零年、五零年代之“漢學”(Sino-

轉化爲以社會科學觀念及工具爲主導之
科學，同一所大學中，有東亞研究、歷史、
政治、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宗教及
關係等教授從事與中國有關之研究及學
動。雖然中美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
仍間中有“冷戰”之姿態，不過對中國

、科際的研究應會持續。“亞洲大趨勢”一書(一九九六年)亞洲版，一九
七年美洲版指出，美國年青人必須考慮學中文，“往西行”(去東亞親身
歷異文化)，以使美國能在太平洋地區繼續競爭。美國人民會採取行動嗎
在隔離主義(isolationism)再度抬頭時，筆者並不很樂觀。不過，下一
一代及Y一代)很有可能突破上一代之文化自我中心(ethnocentrism)。

海外華人在這大氣候中，已積極對中國採取合作，建設謀求國家幸福之態度。文化、教育、宗教界中，與中國對話之代表團日益增加。一九九七年上半年，美國國會，已少有一百名議員，分別訪中、港。筆者認為，只要中美關係維持正常運作，研究、合作，建設應在二十一世紀繼續並強化。

結 論

太平洋兩岸之決策者可考慮在文化劇變之中以積極投入(engagement)應對：

- 一、強化對海外華人及華商之歷史、文化、思想、意識、信仰、學術、企業等之嚴謹學術研究。
- 二、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以“海外華人”及“華商”取代“華僑”之觀念。
- 三、中、美應加強語言教育，美國可從中國吸收大量中文教師；中國之英語教育可繼續採用最新之語言教學法。
- 四、辨別西方歷史中之神本及人本文化，並提倡對兩者在歷史不同時期之表現及影響加以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一詞往往過分廣泛，不容易指出西方思想中各種的學派。
- 五、國內學術界繼續舉辦科際研究及學術活動，使對北美(西方)文化之認識(立體化)。